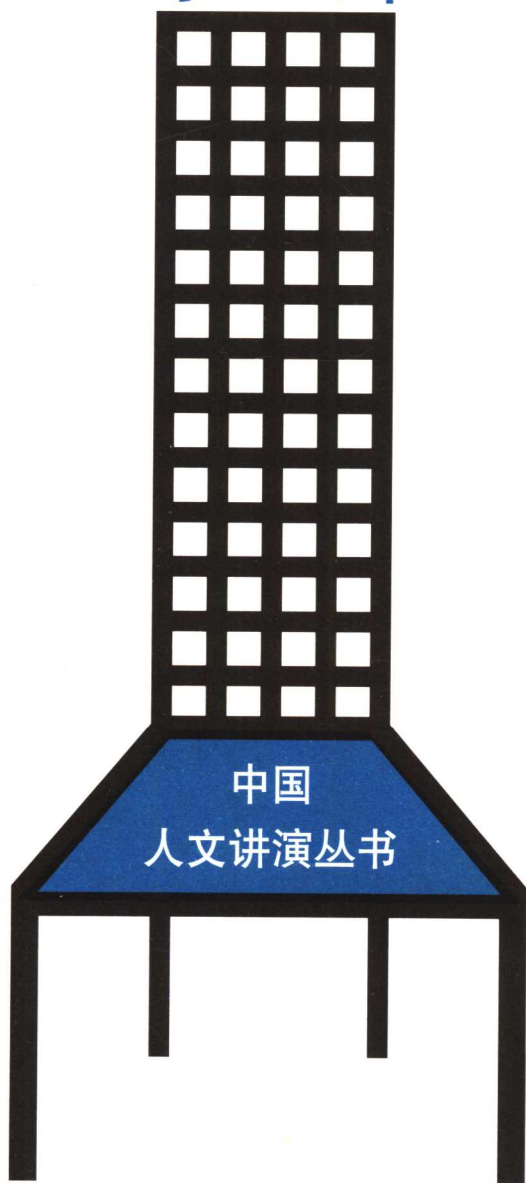


李 辉



中国文人的命运

 郑州大学出版社

李 辉

中国文人的命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人的命运/李辉. —郑州:郑州
大学出版社,2006.1
(中国人文讲演丛书)
ISBN 7-81106-247-X

I. 中… II. 李… III. ①文化-名人-人物研究-
中国-文集②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K825.4-53②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6757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出版人:邓世平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制

开本:710 mm × 1 010 mm

印张:9.75

字数:140 千字

版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邮政编码:450052

发行部电话:0371-66966070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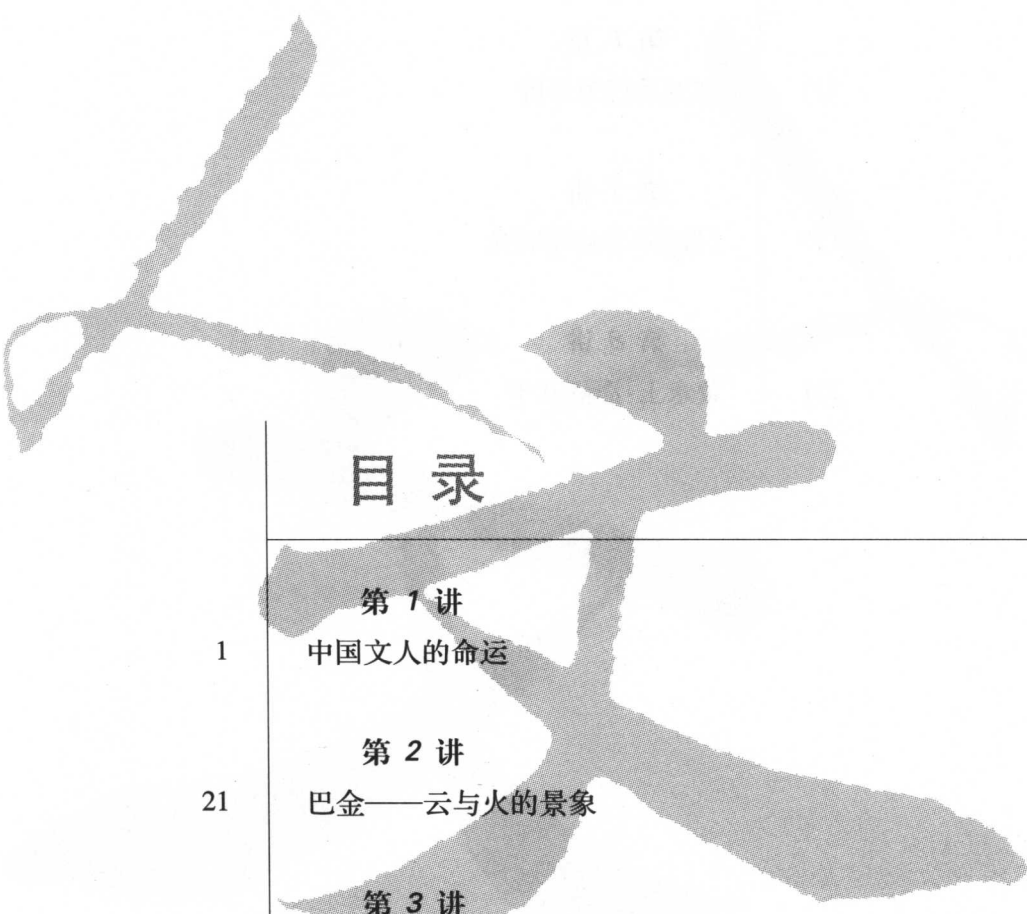
印数:1~5 000

印次: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1106-247-X/I·14

定价: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调换



目 录

- | | |
|----|------------------------|
| 1 | 第 1 讲
中国文人的命运 |
| 21 | 第 2 讲
巴金——云与火的景象 |
| 61 | 第 3 讲
百年沈从文 |
| 85 | 第 4 讲
为什么沈从文曾经受到冷落 |
| 97 | 第 5 讲
开放或封闭：中国文学的选择 |

第 6 讲

111 红卫兵行为分析

第 7 讲

119 《读书》与启蒙时光

第 8 讲

131 黄永玉：潇洒八十



中国
讲演丛书

第 1 讲

中国文人的命运 *

走过二十年

说是走进历史深处,实际上只是表明一种愿望。人们要真正走进历史的深处,恐怕是非常难的。你以为走了进去,但实际上仅仅是在门口转了一圈又离开了。不过,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应该是尽我们每个人的所能,走进历史的真实所在。

历史的领域是非常宽阔的。一个人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他的了解和描述。

二十年前,我参加高考,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回顾自己二十年走过的

* 1998年2月郑州越秀学术讲座的讲演。

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好,思想解放也好,也都是从1978年的上半年开始的。

路,对于我来讲,本身恰恰也具有一种历史感。为怀念母校,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章《复旦这杯酒》。自己二十年来做学术或者是写作的过程,是从复旦大学开始的。我非常怀念二十年前那个开始的时代。

二十年前我非常幸运地成为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学生。所有过去积重难返的问题,各种各样历史的疑案冤案,包括历史的一些课题,在1978年的上半年,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而进入我们的视野,进入我们这个时代。未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好,思想解放也好,也都是从1978年的上半年开始的。我非常幸运地成为与这个时代同步行进的年轻人,二十年来所有的一切,不管是努力也好,成功也好,也都是与这二十年中国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记得我刚到大学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新教材,上课都是随时在调整之中。1978年我们上党史课,这个星期讲彭德怀是反党集团,第二个星期就公布彭德怀平反的消息。时代的大起大落,时代的变幻,把历史的所有问题一下子都摆在我们这些二十一二岁年龄的学生面前。现在回过来再想,从大学一开始,历史的机遇就以它特有的方式摆在了我们这些对历史感兴趣的年轻人的面前。回顾自己写作的过程,我想这二十年的思想界的发展、文化界的发展、历史学方面的包括文学方面的发展,都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我个人的一些思考,也是随着和现代文人的不断接触、逐渐了解而发展的。

我在大学二年级开始做巴金研究,结识了中文系资料室的老师贾植芳先生,他便是我后来写的《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里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当时刚刚从劳动改造状态下解放出来,回到中文系做图书资料管理员,还没有得到平反。我和同学陈思和开始对巴金的研究,便在贾先生的指导下做了一些资料的整理,开始接触现代史上的作家。大学毕业之后,到了北京,我开始在《北京晚报》做文艺记者,这样就更有机会在北京和一些当年还依然健在的现代文人有了接触,譬如沈从文、萧乾、萧军、艾青、冰心这样一批作家。通过了解,我渐渐地对他们的历史产生

“五四”时代所形成的优秀的、比较有意义的传统的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文化界,渐渐地消失了。

了很大的兴趣,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文革”期间书是读得很少的。我小学还没毕业“文革”就开始了,然后就下乡,等于没读什么书。开始读他们的作品就发现教科书上的东西是非常苍白的,而读他们的东西,就感觉到三十年代那个时代是那么诱人,那么让你向往。是什么原因?是哪些东西?这样就渐渐和他们接触。和老人谈话,从他们身上总是能学到很多东西,感受到很多东西。

有这样的总体接触之后,我就有个初步的想法,五六十年代不断的政治运动之后,再包括一些错误的做法,我们这一代人和巴金那个时代的人,甚至再往前,和鲁迅那个时代的情况是非常有隔膜的。也就是说“五四”时代所形成的优秀的、比较有意义的传统的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文化界,渐渐地消失了。而这些东西,通过和他们的接触,你可以想象,比如说谈到三十年代怎么办刊物,或者怎么组稿,或者是报纸上怎么进行讨论,作家之间处于什么关系。了解多了之后,就觉得有很多东西对认识当代中国的一些缺陷、弊病,是可以作为参照的。这就促使我想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界的发展和文人的发展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应该怎么和“五四”时代有一个好的链接。五六十年代之后,大量的学者或者作家失去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只能通过过去的作品和过去的报刊来感受和了解,譬如那时存在的作家间的自由平等的竞争或者自由平等的讨论,或者是创作上的自由精神。而这些,我们这一代或者再上面一代是比较欠缺的。至于他们对传统的了解和东西文化在碰撞中应该怎么结合,这样一种学贯中西的传统,实际上也是丧失了。这样一些感性的认识 and 了解,促使我在描写一个个人的命运的时候,想把一些思考写得又感性又理性,而且能够尽量比较深入地思考我们这一代年青的知识分子所处的位置。

这就是我开始接触这一代人的最初过程。开始是写《萧乾传》,1988年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再接下来写《沈从文与丁玲》,写《沧桑看云》专栏,然后就是关于周扬的一系列访问。实际上都是想借这种传记或者



随笔的形式,比较好的表述方式,比较有文学性的方式,把自己的思考表达得更更有血有肉一些。这就是我的大致创作过程和一些想法形成的过程。

历史的怪圈

接触中国的现代史,尤其是“五四”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我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由于中国的文学和政治的关系,由于中国三十年代以来的变化、战争和后来的政治运动的关系,使得文人之间、文人和政治之间,有了相当大的理解上的难度。也就是说复杂性也许远远超出了一般民族的文化现状。我自己有时候也感到很困惑,这复杂性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考虑?非常的棘手。比如说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胡风牵扯的是目前为止中国最大的文字狱,它原本仅仅是作家间的个人矛盾和宗派情绪,而结果呢,被上升到政治批判的高度,牵涉到几千人,怎么来理解?而且在整个过程中,从四十年代的讨论批判,一直到五十年代、七十年代,甚至到现在为止,因为这样一个历史的恩恩怨怨,而影响到整个左翼文艺的发展,影响到作家之间创作才能的正常发挥。要把它很有条理地地理清楚,也不是特别容易,因为在相关的当事人之间,往往关系是错综复杂的。

我最早接触“胡风分子”是1980年在上海,因为贾植芳的关系,他是胡风集团的主要成员,通过他的介绍,认识上海的一些胡风集团有影响的作家,比如耿庸、何满子、王戎等这样一批人。到了北京之后,我又认识了胡风、路翎、牛汉、绿原,还有武汉的曾卓。从他们身上我感觉到,他们有一些大家认为偏激的方面,但是从做人来讲,我感觉他们在人格上有很值得尊重的地方。因为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谈话、聊天,或者有时候一起吃饭,感到他们都是性情中人。这样一批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大的打击?而他们在和周扬的矛盾冲突中,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他们的做法有哪些是个人性格造成的,哪些是环境造成的,哪些是政治压力造成



所谓走到历史的深处,我的理解就是写胡风集团,就应该对历史负责,不能成为简单的“文革”之后为某些受害者鸣冤叫屈……

的?

同样,周扬也是。我到北京,因为工作采访的关系,也听过周扬做报告,有时候也采访,包括张光年、林默涵,属于整胡风的一派人,也和他们有比较多的接触。在这些人身上,比如说像张光年这些当年直接参与专案小组的,整理材料的,甚至包括舒芜先生本人,我也有一些接触。在认识和接触不同的人之后,再反过来理解这个历史事件,就有个好处,就是有时候能提供很多的资料。我采访了一百多个人,做了很多的记录。

了解当时事件发展的一些过程和每个人的遭遇,这不难,你可以请他们谈,可以了解,有时候可以到实地去考察,这都可以做到。但难就难在你怎么样透过这些事实从历史的高度看这个事件。譬如我本人和贾先生的关系,他是我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有师生之谊,这种关系会不会影响到对事情做一个客观的描述?中央广播电台的记者在采访我时曾问到这个问题。他说,因为你和他们比较熟,和周扬不太熟,那么写作这个东西,会不会使你偏向某一方?这对自己从理论上讲是一个课题,就是怎么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在写作的具体的过程中,就是下笔写作的时候,是为了你所敬重的老师这一派,或者叫这一边来写作呢,还是为了历史而写作,为了把历史真实呈现在今天的读者甚至未来的读者面前呢。



当时我是比较犹豫的,1986年写了一部分,1987年反复思考,然后毁掉,1988年重新来写。写的过程中我就想,应该是按照题目所讲“走进历史的深处”,而不是应该走到老师的深处。我想这其实是一个关键性的、本质的区别。所谓走到历史的深处,我的理解就是写胡风集团,就应该对历史负责,不能成为简单的“文革”之后为某些受害者鸣冤叫屈——当然这是应该的,应该为受害者鸣冤,应该为受害者求得公正的态度,公正的描述。但同时呢?更应该把历史的内在的东西,在历史的错综复杂的冲突过程之中,把知识分子或者文人本身的矛盾性客观地描述出来。

在进行这样一个比较系统的深入了解之后,而且超越他们上一代人本身的宗派情绪、宗派矛盾的局限之外,来看他们当年的一些行为,我发

仅仅局限在某一个历史的环节,局限在某一个人的具体观点上的对或错,仅仅局限于这种细节的话,就很难把历史的震撼性,把历史和人物命运的悲剧性强化出来。

现在中国当代历史上,也就是在左翼文学的发展过程之中,无论胡风这一派也好,还是周扬这一派也好,实际上他们在不断变化的政治运动中,都处在一种被动的、自我消耗的过程之中。也就是我在书里所说的“怪圈”。什么“怪圈”呢?就是今天这一批人在批判胡风,而反过来到了1957年之后,又有大量的批判胡风的人也和胡风分子一样被打成右派。到“文革”初期,包括周扬本人在内,也同时被打成了右派。1955年胡风被关进了秦城监狱,1965年刚刚放出来,当年批准逮捕胡风的罗瑞卿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而后来周扬、夏衍这些人也都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同一个监狱成了中国历史的缩影,这个缩影只有在知识分子、文人和作家身上体现得那么强烈。这就是一种历史的反差,仅仅局限在某一个历史的环节,局限在某一个人的具体观点上的对或错,仅仅局限于这种细节的话,就很难把历史的震撼性,把历史和人物命运的悲剧性强化出来。这个场景,当年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命运,到了最后,又在一个同样的地点重演,这就给了我们很多思考:这样一批作家,他们本应该是在自己领域地创造性发挥才华,丰富知识,然后有所发展,对中国文化有所丰富。但恰恰又是不断地批判,不断地政治的消耗,使他们没有把本应该做的东西做好,而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

举一个例子。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写到五十年代初对《武训传》的批判,主要是批判夏衍,他当时在上海做宣传部部长,是分管电影的,所以批判《武训传》实际上是对夏衍有所批评。这时受胡风影响的一些作家,都写了很多直接批判夏衍的文章,甚至对后来保护夏衍也表示不满。但是仅仅两三年之后,大量的批判又落在了他们的身上。作家间的这种自我消耗,自我矛盾,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也就是说在我们之前那几代人身上表现得非常强烈。《文坛悲歌》是我第一次自认为写得比较满意的东西,或者说自己觉得花了很大的气力来写的东西,加深了我对知识分子的、作家的这种矛盾的认识。这部作品,如果从1980年认识贾先生、开始认识上海的许多“胡风分子”算的话,前前后后用了七、八年的时间。七、

没有大量的资料的搜集,是很难对历史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把握的。

八年的时间,实际上是在随着中国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有各种各样的变化过程来加深对事情本身的认识。

谜团难解——反胡风、肃反与反右

从做资料工作的角度来说,写作《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刚开始在大学研究巴金时,第一项工作是做巴金年谱的编辑和资料搜集,因为那时中国所有的资料都没有。“文革”刚刚结束,大学里也没有资料,都是一篇篇要找,到上海图书馆、上海藏书楼查一些东西,暑假回到武汉,再找一些资料,然后托人在香港再找一些资料,当时的功夫是下在资料搜集上了。现在回头一想,资料搜集对自己认识历史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前提。也就是说,没有大量的资料的搜集,是很难对历史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把握的。在认识胡风集团事件的过程中,资料的搜集花了很大的气力。在没有资料之前,我开始也是想,周扬真坏,等于是利用自己的职权,利用自己的宗派体系,把胡风,把这么多有名的作家打入冷宫,甚至使他们受到迫害,受到监禁。等看到大量的资料之后,有些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不仅仅是个人恩怨在起作用,而是有很多个人之外的因素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包括毛泽东所起的作用,周恩来所起的作用,周扬所起的作用,到底怎么划分?这个过程中,胡风集团案件本身,和大的政治运动的关系,都会使人产生一些新的认识。但是这个认识必须建立在大量的史料之上。



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觉得有两个谜很难解开,虽然我已经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去年又做了补充,把一些新发现的毛泽东的批示、毛泽东的信件、周恩来的批示、周扬的信,又重新补充到1988年发表的《文坛悲歌》里,放到文集里面去。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认识清楚,还很难解答,一个问题是周扬在胡风事件上,他个人的宗派情结和个人品格的东西到底起什么作用。因为从大致情形分析上讲,周扬和胡风从鲁迅时代开始就有很多矛盾,1949年之后,周扬成了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不断

地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但是要说周扬到了后来想把胡风作为反革命分子并且关到监狱里几十年,这从逻辑上分析是不大可能的,周扬不大可能想到后来会发展到那一步。

但是有一个很要害的问题,就是舒芜提供的胡风给他的信,也就是1955年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最早这批材料是舒芜整理好交出来之后,定在5月11日的《文艺报》上发表,已经排出了清样。这是周扬当时都安排好的。发表之后再由《人民日报》进行转载。当时对胡风的批判是由习仲勋和周恩来具体过问的,但是在清样出来之后,周扬并没有交给周恩来,他直接拿到毛泽东那儿去,毛泽东看完之后就当即决定不要在《文艺报》发表,而是在《人民日报》发表,并把题目改成《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现在难以理解,而且也值得分析的就是,第一,为什么周扬直接拿到毛泽东那儿去,动机是什么?这值得分析。但目前没有原始材料,他本人也不在世。第二,他交给毛泽东之后,毛泽东具体是怎么谈的?为什么要来那么大的一个转折,把一个纯粹的思想批判一下子提升到反党集团的程度,最后逮捕抓人。这个问题中周扬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可能永远是一个谜,也可能某一天会有一些历史档案出来,那时候恐怕才能算真正地走到历史深处。我认为胡风事件的真正转折点是把校样送到毛泽东那儿之后,最后被定为反党集团的。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细节,而这个细节是目前为止我自己也不可能了解到的。

第二点就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全国肃反运动,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从时间上看,潘汉年、胡风相继被捕。关于胡风的材料1955年5月13日公布,5月16日开始,胡风集团几十个人,在全国各地陆续被捕。然后紧接着批胡风的文章连篇累牍地铺开。6月初发表社论,全国开展肃清反革命的运动,肃反就在下半年在全国展开。到现在为止这也是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究竟是潘汉年事件和胡风事件的发生促使了毛泽东决定在全国肃反,还是毛泽东早就有要做肃反运动的计划和想法,然后拿胡风集团作契机,从文化界开始。这两者之间

我就觉得在中国当代史上,1955 年是关键的一年,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知识分子,在于作家,而是在于历史的演变,历史形成的变化。

谁是主谁是次,谁是起因谁是结果,都耐人寻味,值得思考,值得认识。如果说是因为胡风事件加深了毛泽东对现实的忧虑,对生活中还有大量的与国民党政权有关系的知识分子的恐惧,必须进行一些清理,那么就说明胡风事件本身的严重性使他产生一种警惕性,然后决定在全国各地进行肃反,这就说明胡风事件处在一个主要的位置,事件的严重性足以引起政治家的警觉和认识。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早就准备要发起这样一个大的运动,恰好周扬拿来校样,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毛泽东作决定,就是拿胡风集团做先声。潘汉年虽然是被捕了,但是潘汉年开始只是一个孤立事件,潘汉年被捕和胡风被捕是同一个消息。一个来自北京,一个来自上海;一个党内,一个党外。潘汉年的事情仅仅作为一个党内的问题,没有进一步能证明党内有潜伏的特务、潜伏的内奸,而胡风问题就扩展到更大领域。这就说明毛泽东有肃反的意图,胡风集团的事件仅作为一个借口而已。这两者的分析,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能判断哪一个主要的,哪一个是次要的。有了大量的史料之后,才能提供一种思考的空间,因为很多史料是互相引证,有时又是互相矛盾的,这实际上就是拓展思维的一种路子,就是说怎么样把问题想得更深一些。



肃反运动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没进行一个很深入的了解。肃反牵涉的领域是非常广的,牵涉到几十万人。我认为,恰恰是 1955 年的反胡风和肃反导致了 1957 年大鸣大放中大量知识分子起来发泄不满,或者是对于一些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做法进行批评,结果又导致了大量右派分子的产生。有了这些认识之后,我就觉得在中国当代史上,1955 年是关键的一年,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知识分子,在于作家,而是在于历史的演变,历史形成的变化。

如果没有 1955 年,很可能 1957 年大鸣大放的规模和内容就会有所变化。我最近在写关于黄苗子、郁风夫妇的传记,刚刚完成,写“二流堂”中的吴祖光、丁聪、黄苗子、郁风、金山、张瑞芳、盛家伦,到张光宇、张正宇这

样一批漫画家,他们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命运变化。实际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是因为 1955 年受到冲击,到了大鸣大放的时候,便出来为胡风集团的一些人打抱不平,认为当年的处理是过分的。结果,一些人又成了右派。因此,可以说,没有 1955 年的历史事件,1957 年很多人的命运就会是另外一回事。吴祖光、丁聪、黄苗子,包括聂绀弩,这批知识分子 1957 年的一些错误罪证里面,其中一条都是为胡风集团鸣冤叫屈,这是他们一个重要的内容。我所了解的,很多都是这个问题,包括一些当年的右派大学生。

有了这些认识,就不会把一个简单的、单独的事件孤立地看,而应该把它和前后历史的渊源联系起来,做一个历史的全方位的全面的认识。

有了这种全面的把握,对于历史的认识才能够更加接近历史的事实。

当然不是说我所了解的和我所想的就一定是唯一的解释,只能说是建立在我自己所了解的史料基础上的一种我目前所能达到的自认为是真正属于历史本来面目的东西。我想历史学家是有这种理论的。包括写传记,每个人写的人物,包括所描述的事件,当然有个人主观的色彩在里面,不可能说他写的那个人物就完全是这一种形态,很可能有多种形态,每个人了解的可能都不一样。



历史场景中的周扬

写完胡风就一直想接下来写周扬,因为周扬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在三十年代初和鲁迅的矛盾一直发展到后来和冯雪峰、胡风、丁玲的矛盾,贯穿了半个世纪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同时,他自己的思想演变,比如说去延安之前在左联时期的状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鲁艺时代,然后到 1949 年之后,“文革”前十七年的状态,到“文革”后的自我忏悔和人道主义异化时候的周扬,都是有他的变化,是不同的。我想写周扬,已经准备了十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写出他的传,为什么? 越了解越觉得难写。同样一个时间,同样的在“文革”后的自我反省,给人的印象

是不一样的。比如他的自我忏悔。他感觉到自己过去整了很多入,感到很痛苦,一讲话就哭,有些作家也都很原谅他。但同样这个时候,又有另外一些人认为他的忏悔是虚伪的。同样的时候,不同的人士说话绝对不一样。所以我就先做了一些与不同的人谈周扬,我想用这种方式可能比自己现在匆匆忙忙地来写,能给所有关心历史人物的读者更大一些的思考空间。

我做了一些采访。从夏衍开始,到林默涵,到王元化,到王若水,到他同时代一起工作的,包括龚育之,包括于光远,然后再往下,受过他打击的,比如说胡风的夫人梅志,丁玲的丈夫陈明,包括周扬前妻的两个儿子。很多事实都是通过采访才能了解到的,而且一了解之后,才知道周扬这个人并不是原来所想的那么简单,或者仅仅是一个反面的形象,或者是一个正面的形象,或者是一个悲剧的人物,或者是一个喜剧的人物,都很难概括。越是这样,越是觉得这个人物太难写,但是越是这样难写,就越对你有诱惑。



我还是愿意把周扬的题目做下去。我自己觉得,在二十世纪写完胡风之后,能够比周扬更有分量的,能够通过一个人物反映中国一个时代的并不多。他1989年去世。他的一生贯穿了整个左翼文艺运动过程。从1985年作家代表大会之前,一直上溯到左联时代,这样一个长达五十年的过程。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他是一个中心,围绕他能够写出来很多政治上的、文化上的、文学的、人际关系的东西,各方面都可以通过他呈现出来。

面临历史的复杂性,或者复杂的历史之中,个人的行为,个人的言行,个人的举动,甚至个人和政治家之间的种种关系,怎么来梳理得更清楚一些,这绝对是一个挑战,有着很大的困难。我前两年写过关于冯雪峰的文章,写关于夏衍的文章,写丁玲的文章,实际上也都在为写周扬做准备。如果把他周围的很多人认识得深一些,跟他有关的人了解得更多一些,写得更多一些,可能对周扬本人的认识也会更深一些。

比如说采访夏衍,夏衍就谈到周扬刚从日本回来时,在左联时代,其实是非常风流倜傥,穿着西服,歌舞厅、酒吧、咖啡馆经常去,看电影、跳舞,是非常潇洒,非常活泼的。到了延安之后,等他们 1949 年在上海重新见面时,他就感觉出周扬已经有所变化了,和朋友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更多的话可说了,也比较拘谨。再往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就基本上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天地里,和下级永远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态度,内心的东西没有和朋友讲。张光年的回忆也谈到这个问题,张光年在他领导下工作,也是周扬非常欣赏的一个助手。但是张光年也觉得,第一,周扬没有生活情趣;第二,没有朋友,没有真正可以谈心的朋友。而周扬的早年恰恰不是这样的。这种变化和革命的关系,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和政治政策之间的关系,个人性格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到底又是怎样相互影响、相互变化的,这又是可以分析的。



从周扬本身来讲,他到了晚年人道主义异化,然后受到批判作了检讨之后,坐在家里看电视,一坐几个小时,一句话没有,只是和他的夫人苏灵扬坐在一起发点牢骚,而他自己不和任何人讲,这对他后来整个病情的变化,肯定是有直接联系的。假如他愿意找朋友谈谈心,发泄发泄不满,可能也不会一下子就病倒。像这些因素,像这些细节,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分析和了解。

鲁迅与毛泽东

我想到鲁迅。

关于鲁迅,我过去一直觉得困惑不解的就是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是非常高的,1936 年鲁迅去世之后,把鲁迅称为“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思想家,中国民族的脊梁”,评价非常之高。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很实际的历史事实是什么呢?恰恰是鲁迅晚年最不满的、成为鲁迅对立面的周扬,后来成为毛泽东在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最信任的领导人。而和鲁迅关系好的,比如说冯雪峰、胡风,然后再就是萧军,受牵连的丁玲这样一些